

李敖 大合集

7
孙中山研究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李敖
大合集

7

孙中山研究

孙中山研究 孙逸仙和中西西化医学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李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版李敖大全集/李敖著.——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10.7

ISBN 978-7-5057-2752-6

I. ①新… II. ①李… III. ①李敖-全集 IV. ①C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99401号

出版编辑委员会 王东升 孙以年

史宝明 张 纯

责任编辑 杨学梅 马 瑞

周亚灵 邵嘉瑜

装帧设计 海云书装

书 名 李敖大全集

作 者 李敖

出版/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营销/推广 北京创美时代国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710×1000毫米 16开 930.75印张 14644千字

版次/印次 2010年7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57-2752-6

定 价 2000.00元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号楼

邮编/电话 100028 (010)64668676

新版《李敖大全集》编撰说明

一、1999年1月,中国友谊版《李敖大全集》(1—20卷)在北京出版。逾年,《李敖大全集》(21—40卷)面世。十载光阴,世事沧桑。对李敖先生洋洋四十卷大著重新进行修订、梳理和再编辑,实属必然。

二、新版《李敖大全集》将李敖先生的一千四百万余言著述,按“文学与自传”“人物专题研究”“传统与文化专题研究”“历史与时政专题研究”,以及“私房书”和“杂写集”六大主题分类编排,摒弃了原台湾版“合订本式”的编撰方式。

三、新版《李敖大全集》收录李敖先生的著述更为丰富、全面。与十年前出版的“大全集”相比,增加的篇目文章字数总计一百四十余万言。

四、新版《李敖大全集》的编撰,仍沿袭与李敖先生约定的基本原则,即“只删不改”“删节段落用省略号表示,并标明‘编者略’”“未采用之篇章在卷首目录中标明”,以期尽可能保持李敖先生著述的全貌和原貌。

五、新版《李敖大全集》的编撰,遵循有关规定,对涉及不能为大陆读者认同的政治取向的内容做了技术处理;对学术思想及观念上的差异则保持原貌;对台湾党政机构名称和职务称谓,采用加引号的处理方式,但引文内和引号内的则不再加引号。特此说明。

在新版《李敖大全集》即将付梓之际,衷心感谢李敖先生长期以来对中国友谊出版公司的信任,将他几乎全部著作的中文简体字版本交由我公司在祖

2 | 李敖大全集(卷7)

国大陆出版。衷心感谢新闻出版总署、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对新版《李敖大全集》的出版所给予的支持和帮助;感谢其他所有为新版《李敖大全集》的出版给予支持和帮助的朋友;并诚恳期待各界读者对我们编撰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错误予以指正。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09年12月

新版《李敖大全集》编撰说明/1

《孙中山研究》(1-129)

孙中山见了李鸿章吗? /3

孙中山向清吏下跪求饶

——伦敦蒙难罗生门/17

孙中山的一个错误/48

孙中山反对双十国庆/55

孙中山《国父遗教》不可不读也!

——竹联帮心读/57

孙中山蒋介石逼反老同志

——替陈炯明翻翻案/61

孙中山蒋介石为什么不殉国? /89

孙中山不准再打炮/93

孙中山与林肯名言

——我对葛底斯堡演说的疑义/96

孙中山把三民主义作为“统战工具”

——扭曲了的“纪念”/114

孙中山的第二兴趣是“女人”/

——革命以后干什么? /121

孙中山与陈粹芬

——毋忘孙夫人/123

《孙逸仙和中国西化医学》(131-288)

新夷说(代序)/133

引子——巫医与西潮/196

从“基督”到学医/199



目录

中国第一个西方医钮

——广州博济医院(Canton Hospital)/216

香港第一个西医大学

——香港西医书院(Col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 Hong Kong)/232

“改良”与“革命”之间/248

从行医到革命/259

回到“医生”，回到“基督”/274

本卷未采用之篇目：

《孙中山研究》

《孙中山研究自序》《孙中山与告洋状》《孙中山与卖国大比赛》



目录

李



孫中山研究

教

孙中山见了李鸿章吗？

八十三岁的老国民党桂崇基，在6月1日的《传记文学》上，写了一篇《中山先生见李鸿章》，原文如下：

中山先生上李鸿章书，世人固多知之。他是否见过李鸿章，则因缺乏资料，难以臆断。据唐绍仪言，一次，他返回香港，曾晤中山先生，见其器宇轩昂，其时不过二十许人，即怀有大志，便断言其必将为大器。中山先生出示其所拟上李鸿章书，并请唐设法介绍见李鸿章。时唐在高丽袁世凯幕府任事，对于北洋有关人物多直接或间接认识，便代为介绍天津海关候补道徐秋畦。中山先生去天津，由徐秋畦向李鸿章为之先容。届期，徐秋畦陪中山先生往见。李鸿章见中山先生即问你叫什么名字？中山先生答孙文，其时中山先生发音犹带浓重广东音，把文字念门音。李鸿章一听，便说，你官话都不会讲，怎能做官？未及二三语，即端茶，差官乃高呼送客。徐秋畦乃拉中山先生一同起身告辞。行至二门，中山先生便在庭中大骂李鸿章是官僚。徐秋畦见状大为恐慌，直冒冷汗，未久，唐绍仪来天津，徐秋畦告其与中山先生谒见李鸿章经过，并言以后你不要再请我介绍任何人晋见李中堂了！

看了这篇文字，我忍不住要对自己说：“国民党又造假历史了，我非拆穿它不

可!”下面就是我这违章历史拆除大队的一次成绩。

唐绍仪见了孙中山吗?

桂崇基是江西贵溪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硕士,1925年回国任教广东大学(中山大学前身),后任考选委员、国大代表。来台后任东吴大学校长。他因为在国民党内斗中,很早就给斗下来,所以早就过气了。不料他不甘寂寞,写《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等书之不足,又来这么一段历史,有历史训练的人,一眼就可看出它是捏造的,为什么呢?

原因很简单,一核对唐绍仪和孙中山的生平,便明白了。

唐绍仪,广东香山(中山)人,1859年生,1874年清廷派出幼童赴美留学生,他是其中之一,毕业于耶鲁大学。光绪初年回国。1884年,由北洋派驻朝鲜帮办税务,得到袁世凯赏识,1895年,随袁世凯在小站练兵。1899年4月,李鸿章出任两广总督,他随同赴任;11月,袁世凯出任山东巡抚,他又随同赴任。后来历任奉天巡抚、邮传部大臣。辛亥革命后,任北方代表与南方谈判。民国成立,任临时政府内阁总理,后来历任外交总长等职务。他虽跟孙中山关系不错,但孙中山死后,不容于国民党南京党中央。1928年9月30日,国民党以他会被日本人利用做借口,派特务以利斧把他劈死在上海,死时八十岁。

照桂崇基所说,唐绍仪在香港见到“二十许人”的孙中山,孙中山“出示其所拟上李鸿章书”,但按此书写作年代,该是1894年,这年唐绍仪正在北方追随袁世凯,跑到香港去见比他小七岁的孙中山(孙中山那年二十九岁),已极可疑,因为当时孙中山无籍籍之名,唐绍仪“返回香港”去见他,又所为何来呢?

何况,既说唐绍仪“返回香港”见孙中山,则孙中山本人,必须人在香港,才有见到的可能,无奈这年孙中山根本不在香港,他人在广州做医生,并且2月起就“以医务委之于尹文楷,自偕陆皓东自湖南循长江东下,抵上海”(《国父年谱初稿》)了,纵使唐绍仪“返回香港”,也见不到孙中山啊!

陈少白回忆

1882年,孙中山十七岁时就结交了陈少白等,被呼为“四大寇”。陈少白后来在《兴中会革命史要》里,曾有这样的追忆:

有一天,我在香港,他在广州,忽然药房里有信来,说:“孙先生失踪了,药房中开销很难,收入不敷只剩十几块钱了。”我接到信,就到广州去,替他维持店务。等了多天,一点消息都没有,心里非常焦急。到十六那天,他忽然跑来了,手里拿了很大一卷像文件的东西,他见了我就说:“对不起!对不起!”我问他:“你跑到什么地方去的?”他说:“这些事情不要去管他了。”就打开手里的一卷纸给我,我拿起来一看,里面乃是一篇上李鸿章书,我方才知他是跑到翠亨村的家里关起门来做文章去的。他叫我替他修改修改,我就随便修改一下,以后,他对于药房也不管理了,就到上海去要把这封信上给李鸿章。我没有办法,就让他去,同时我就替他两间药房收拾起来,交回那些出过股本的人。

孙先生到了上海,找着了一个香山人,就是著《盛世危言》的郑观应(字陶斋)托他想方法见李鸿章。有一天,在陶斋家里碰到一位太平天国的状元王韬(号紫铨,别号天南邈叟),王韬曾到过香港助英国牧师沥博(Dr. Legge)翻译四书五经,沥博士回英国也请王韬同去,在英国住了几年,后来回到香港,为《循环日报》主笔。再回上海来,声名很盛,笔底对于世界知识,也很充分,并且他是和太平天国有关系的人,所以孙先生在陶斋家里一见如故,就把那篇大文章,同王韬商量起来,王韬也重新替他加以修正。

这时候,王韬有一个朋友在李鸿章幕下当文案,王韬就写了封信,介绍孙先生到天津,见这位李鸿章幕下的老夫子,同老夫子商量,或者可以见李鸿章,孙先生快乐极了,就到天津去见老夫子。那时候,刚刚中日大战,打得很厉害,李鸿章至芦台督师,军书旁午,老夫子把孙先生的大文章送到李鸿章那边去,李鸿章是否看过,就不得而知了。不过后来李鸿章说:“打仗完了以后再见吧!”孙先生听了这句话,知道没有办法,闷闷不

乐的回到上海,陶斋看见了,就替他想方法到江海关去领了一张护照,请他出国去设法,孙先生也就乘轮到檀香山去了。

孙先生所以要上李鸿章书,就因为李鸿章在当时算为识时务之大员,如果能够听他的话,办起来也未尝不可挽救当时的中国,岂知所有希望完全成泡影。所以到了这时候,孙先生的志向益发坚决,在檀香山就积极筹备兴中会,找人入会,一定要反抗满洲政府。大约在是年(甲午)八九月之间,就正式成立兴中会。

由于陈少白是孙中山的老友,他的回忆,最值得重视。当然他的回忆也须加以考订。例如他说郑观应与孙中山的关系,就太疏略了,此事牵涉到上李鸿章书的内容,不可不先弄清楚。

郑观应影响孙中山

郑观应(1841—1923),原名官应,字陶斋,广东香山。他生于鸦片战争时代,觉醒于英法联军时代,在成年以后,为了救国,放弃科举,改行从商,努力学习西方语文,了解西方富强之道。

在清末洋务运动中,郑观应曾多方面的参与,他做过不少有关富强的文字。1862年,他出版《救时揭要》,后来三十年间,陆续增订,最后成为《盛世危言》。

《盛世危言》全书共分十四卷,一至四卷为《富国》、五至七卷为《开源》、八至十一卷为《强兵》、十二至十四卷为《节流》,共一百零二篇。有某些篇后还附有英、法、德、俄等国有关资料和张之洞、薛福成等人有关文章。

1892年,郑观应在这书初刊自序中写道:

六十年来,万国通商,中外汲汲,然言维新、言守旧、言洋务、言海防,或是古而非今、或逐末而忘本,求其洞见本原、深明大略者,有几人哉?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此言虽小,可以喻大。应虽不敏……乃知其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兴学校、广书院、重技艺、别考课,使人尽其才;讲农学、利水道、化瘠土为良田,

使地尽其利；造铁路、设电线、薄税敛、保商务，使物畅其流。……

这些议论，自然是两年后孙中山上李鸿章书中“人尽其才”“地尽其利”“货畅其流”的张本。孙中山是郑观应的老乡，也是朋友。郑观应影响孙中山，自不待言了。

国民党捏造历史

现在再回看陈少白的追忆，便知道上李鸿章书，乃是孙中山完稿在上海见过郑观应之后，不但不成于广州，更不成于香港了。既然如此，又何来桂崇基所说的孙中山在香港向唐绍仪出示上李鸿章书呢？

至于桂崇基说孙中山因唐绍仪之介，得识徐秋畦的事，也不能成立。据《国父年谱初稿》，1894年6月，孙中山“偕陆皓东至天津，上书李鸿章”，“先生在沪遇香山同乡郑官应，由其函托王韬介绍于李鸿章幕僚罗丰禄。迨先生偕皓东抵天津后，先访罗，又得徐秋畦为先容，求介见鸿章，先以书进。”则徐秋畦和孙中山的搭线，是罗丰禄而非唐绍仪。徐秋畦是李鸿章的幕僚，陈少白回忆中的“李鸿章幕下的老夫子”，该是指他。桂崇基说徐秋畦带孙中山见李鸿章的一些细节，虽然有趣，但是非常可疑。原因无他，以李鸿章的忙、李鸿章的大架子，他是根本不会见孙中山的！

但是，若说李鸿章根本不会见孙中山，这对国民党的附会之徒说来，是认为脸上无光的，所以，他们就开始捏造历史。胡去非在《孙中山先生传》（1931年8月上海商务印书馆版）里，曾集这种捏造之大成，胡去非说：

至北京时，冒险谒李鸿章，密陈北京政府之横暴腐败，革命之不可缓，议论雄快。李谢之曰：“今日之革命，余亦知其不可已；然余年七十有九，精力既衰，断不能大有为，幸君努力为之，中国前途，唯君等是赖，余必为君后援”云云（见时事新报馆编《中国革命记革命党小传》）。吴稚晖编年系“别传”云，中日交战前，先生由湖南出扬子江口，由海路入北京，深夜冒险晤李鸿章于私邸，陈说大计，劝李革命。李以年耄辞。此为癸巳二十八岁以前之历史，即自传所谓“十年如一日”也。

到台湾后又大造特造

胡去非本人后来也不信这些捏造,他在《总理事略》(1937年10月上海商务印书馆版)中,就有“先生见李鸿章不遂”的更正。但是国民党逃到台湾后,却把这一捏造,花样翻新起来。首先是1965年11月11日《新生报》登出“中央社特稿”——《万世风范的国父》,其中说:“在国父演讲时曾担任过记录的中国广播公司董事长梁寒操,讲了八个有关国父生前的小故事,来纪念国父百年诞辰。”梁寒操讲的第一个故事是:

国父在二十七八岁的时候已经出来行医,有一次他满怀爱国报国的热忱,上书李鸿章,并由唐绍仪陪同,去见李鸿章。当时李鸿章还没有看完国父所上的书,就老气横秋地对国父说:“天下大事困难重重,不是你们年轻人所能够了解的。”国父辞出后,大为光火,眼睛冒出愤怒的光芒对唐绍仪说:“我起先以为李鸿章很行,现在才知道他根本不行,我的建议他干不了,我自己来干!”

梁寒操做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也是老广(广东人),他带头造这种谣,由“中央社特稿”方式发出,自然就愈来愈绘影绘声了。难怪此后国民党宣传媒体上,不但把孙中山见李鸿章的电视画面,弄成李鸿章一派诚惶诚恐模样,并且干脆就说孙中山当时是去“招降李鸿章”了!——国民党捏造历史,竟逸出常识,一至于此,国民党真太目中无人了!

梁寒操捏造历史中,提到孙中山见李鸿章是“由唐绍仪陪同”的,这种捏造,未免太粗糙;所以十八年后,这一捏造由桂崇基翻做,变成唐绍仪是中间人了,而“陪同”的,又换成徐秋畦!当《传记文学》的编者向桂崇基专函请教出处的时候,桂崇基说:这是“民国二十年左右”唐绍仪亲口对他说的!他居然把这段秘史埋在心里五十多年,真是天晓得他在干什么啊!

介绍人还有盛宣怀

最近,我的老师吴相湘《孙逸仙先生传》出版了,他对孙中山这段公案,有了新的资料与解释,他根据大陆资料,提出了一封郑观应给盛宣怀的信,信中说:

敝邑有孙逸仙者,少年英俊,囊在香港考取英国医士,留心西学,有志农桑生殖之要术,欲游历法国讲求养蚕之法;及游西北各省履勘荒旷之区,招人开垦,免致华工受困于外洋。其志不可谓不高,其说亦颇切近,而非若狂士之大言欺世者比。兹欲北游津门,上书傅相(李鸿章),一白其胸中之素蕴。弟特敢以尺函为其介,俾其叩谒台端,尚祈进而教之,则同深纫佩矣。

再肃者:孙逸仙医士拟自备资斧,先游泰西各国,学习农务,艺成尔后返中国,与同志集资设书院教人;并游历新疆、琼州、台湾,招人开垦。嘱弟恳我公代求傅相,转请总署给予游历泰西各国护照一纸,俾到外国向该国外部发结游学执照,以利遄行。想我公有心世道,必俯如所请也。

吴相湘说:

盛宣怀接阅郑观应信后,曾致函李鸿章,介绍孙先生往见。孙是否见到李,文献无征。但多数记载肯定孙李没有晤面。因当时中日为朝鲜东学党之乱,两国正调兵遣将前往三韩。李鸿章忙于这军国大事,自无暇接见孙。但孙先生在三年以后一论文中指出:“当我在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夕,正停留天津;那时曾亲眼见到有许多文武官员自全国各地赶来向当时权倾一时的宰相李鸿章晋见,在蒙允晋见之前,无不需与馈赠巨额红包给他的僚属。”孙先生既正努力革除陋习,当不会纳贿求见。

吴相湘说:“孙先生既正努力革除陋习,当不会纳贿求见。”以这一理由而不能见李鸿章,是可疑的。因为见李鸿章是大事,孙中山识其大者,当不致因小失

大。我看根本的原因还是孙中山当时人微望轻,李鸿章不肯见他而已。

吴相湘的新见解

吴相《补注》里,提出一个孙中山上李鸿章书的新说法,他说:

孙先生所以如此不惮烦请托,请人作书转求李鸿章,完全是八十余年以前,满清皇朝除选派十五岁左右幼童赴美留学,并另选派福州马江海军学堂等校毕业生赴英习海军以外,根本再没有其他官费生、自费生赴外国留学(自1898年以后,才逐渐有少数人东渡赴日游学,因不需护照)。自然更没有如民国以来的留学规程,以及近年的公自费留学生考试,或外国大学给予研究奖学金,甚至出国观光等都可以申请发给出国护照,经过外国使领馆签证即可启程。而当时赴欧洲必需护照,尤其美国1882年成立禁止华工入境规条后,由国人前往美国非常困难,有时大小商人前往也被视作“苦力”(劳工)不准入境,或被拘留后逐回。孙先生是广东人熟知这些情形,权衡轻重利害,如其徒耗金钱时间冒险远行而被虐待侮辱逐回,不如在出国以前尽一切可能设法求取护照,以策安全。

当时自费出国求学既无成例。孙先生这一请求完全是借重李鸿章一言九鼎的重要地位,以及李与香港西医书院关系能致函总署特准这一“破例”或“创例”。能否成功,并不可预料。并且郑观应致盛宣怀书中虽言明孙的学历以及他自备资斧,并无金钱上请求;但自医士改习农事,无论如何是一转变。……故孙先生上李鸿章书是深望李“玉成其志”万不可少的“敲门砖”。

因此,吴相湘认为孙中山“上书李鸿章请发出洋护照”一点上,才是当时实情。这一立论固非未见,但是孙中山若目的只在“请发出洋护照”,似乎不必这么麻烦的上万言书,也与郑观应给盛宣怀信中所说的“一白其胸中之素蕴”目的不合,他如只志在护照,盛宣怀的八行书直达李府应该就够了,盛宣怀“介绍孙先生往见”李鸿章,就未免多事了。